

辩证思维视角下翻译批评“度”的把握

冯春桂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翻译批评作为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翻译学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检验作用。作为一项活动联系着理论的完善和翻译活动实践的展开,备受理论家和学者的关注和反思,意义和价值深远重大。在此过程中把握做好翻译批评的“度”尤为重要。本文拟从翻译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译者)的关系;批评方法的把握和选用;评判标准设定等三个角度对此问题作一些讨论,以对翻译批评者在进行翻译批评活动中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辩证思维;翻译批评;“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1-0077-04

翻译批评作为整个中国翻译史、翻译思想史和翻译研究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支谦到钱锺书,曾吸引了无数翻译家、文学家和哲学家的注意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翻译批评活动发展史是前进与曲折统一的历程,这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翻译批评活动发展的过程中予以解决,这对翻译事业的发展极为重要,“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地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翻译批评十分重要”^{[1][21]}，“译事业要发展,要繁荣,永远离不开翻译批评的鞭策和推动”^{[2]6}。所以翻译批评活动的开展在整个翻译活动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如何合理、科学、公允地进行翻译批评中,翻译批评“度”的把握是其首要考虑的方面,是决定翻译批评是否能够保持其内在规定性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唯物辩证法中的“度”是指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限度(或范围、幅度),它体现着质和量的对立统一^{[3]159},正确理解和掌握事物的度对认识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贯穿、蕴含于翻译批评的整个活动之中。正确认识了翻译批评的度有利于我们准确把握翻译批评的质,使在进行翻译批评活动中有正确的准则,因而“度”把握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翻译批评的性质和属性,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一 批评者与被批评者(译者)

翻译批评活动中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处于一种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范畴之中,批评者作为翻译批评活动的发起者具有主动性,被批评者(译者)是批评者批评对象的直接承受者,具有被动性(有时被批评者也会转化为具有主动性的批评者而批评者也会转变为具有被动性的被批评者,如在对翻译批评的批评中等)。双方之间协调和统一直接关系到

翻译批评“质”的问题,“质”在唯物辩证法里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在规定性”^[3],即在翻译批评中双方关系处理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翻译批评是否是我们预期的翻译批评,是否还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批评。

在这对对立统一的矛盾范畴内由于矛盾双方都是具有意识的主体性的人,都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双方没有正确理解、把握翻译批评内涵和本质的情况下,在批评与被批评的状态下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消极状况,且由于职业相似或相同性会产生“同行是冤家”的现实,这使得某些翻译家(在进行翻译批评时即成为批评者)言辞过于激烈地相互攻击,甚至谩骂,使批评变成斗争和批判,使得批评成为获得声望的霸权工具,这种情况在翻译界是存在的,如,胡适和郁达夫、傅斯年对严复翻译的攻击等,这些状况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脱离了原本意义上翻译批评内在的规定性的,使批评超越了一定的“临界点”^[3]。所以在协调这对矛盾的过程中,首先,批评者应当本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从推动我国译事发展的高度出发,以说明解决问题为重,对事不对人;其次,批评者应严以克己,意在指出谬误、纠正偏差、以利译者改进,并使其他译者引以为戒,不以个人的好恶为出发点,不唯名是从,克制自身的情感,正如成仿吾所说“我们不要忘了感情这条恶狗,是想往斜路上走去的”^{[1]21}。从而使翻译批评中感情的倾向、偏爱、私见的状态最小化;第三,对于被批评者(译者)而言,则应虚怀若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好自身的思想工作,因为即使批评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可这种否定是一种肯定性的否定,是一种修正完善的过程,“积极的翻译批评实际上是对被批评者的爱护,这并非夸张,亦非矫情,何况对所有的被批评者(译者)来说,

翻译水平的提高都是无止境的”^[42]；第四，被批评者（译者）应当意识到积极的批评（肯定性否定）并不是出于批评者自身的学术才华的炫耀和张扬，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推动整个翻译批评的发展，从而更好的制约和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完善，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翻译批评量的积累，从而让我们对翻译批评“质”有了进一步清晰的了解，实现翻译批评“度”的优化，从而促进翻译批评“质”的提升；第五，被批评者（译者），对于所评的各点该接受的接受，该说明的说明，应当据理力争，不必客气，在翻译批评中我们既要反对“棒杀”和“捧杀”，又要反对“老子天下第一”和“我做不好，你‘来做碗好的看’”^[5124]；最后，翻译的复杂性的存在使得批评者找出错误和不足的层面上很极为容易的，但批评者自身也应注意处理和协调各种因素，“对于一个批评者而言攻击译者的错误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我们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译者是极易招致批评的，好的翻译能够容忍错误的存在，译者采用与原文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可能是有意为之，不论这样做会带来这样的误导，倘若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批评者就应该找出这样做的原因”^[6186-187]，所以批评者在进行批评时做好自身的批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推崇学术自由，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学术交流和良好氛围，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理性“度”的范围之下，利用翻译批评的学术领域进行个人的、私有的矛盾论战是不可取的，不科学的，也是翻译批评领域所不允许的，更是不道德的。

二 翻译批评方法与翻译批评的“度”

方法是从事活动过程中为达到或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和途径的范畴，方法应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如何对其结果有着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在翻译批评中翻译批评的方法问题是翻译批评的效用等实现的纽带和中介，合理、科学的翻译批评方法会促进翻译批评的发展，反之则会妨碍翻译批评内在效用性的实现，从而不利于促进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在我国翻译界较早提出建立翻译批评方法理论体系的是翻译家焦菊隐先生，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出于多种原因中国译界对翻译批评方法论探讨的并不充分，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十分薄弱的，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初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后才有所转变与改观。许钧指出，“要开展有效的批评，必须掌握客观、合理和科学的批评方法”^[743]，至2001年，温秀颖等在《英语翻译教程》一书中首次为翻译批评下了定义，他认为“翻译批评的方法就是批评者

在各种翻译批评实践中，为达到某种批评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手段和方式。它是连接批评主体与客体的中介环节，并在两者的辩证运动中获得经验材料”。并从三个层次（哲学层次、逻辑学层次和具体学科层次）对翻译批评方法进行了阐述^[8211-213]。

翻译批评的对象在根本上与翻译涉及的各个要素密不可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涉及两种语言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碰撞、整合、交融，这一过程中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翻译批评者进行批评时在批评方法的选用上是十分重要的，这关系到翻译批评能否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批评的目的。正如契诃夫所说，“对于从事分析的人来说，如果他是学者或者批评家，方法就是才能的一半”^[13]，正是基于翻译批评方法具有诸多的重要性，因而在翻译的批评活动中对翻译批评方法本身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从而更好的实现翻译批评内在规定性的预期目的。笔者认为，翻译批评的方法可从其属性和构建两大方面进行把握和审核，下面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方面，翻译批评方法从其属性上而言应为全面客观的统一：在翻译批评的实践中，方法的客观性从理论上来说应不带有任何主观性，体现着科学、公平与公正。而在翻译批评实践中充当翻译批评主体的是翻译批评者，具有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受翻译者客观存在的“本体”的制约。出于对世界本源理解和回答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各种相异的“本体论”，这样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就显示出“本体论决定方法论，或者说具体的方法体现着一定的本体论观点”^[9170]，具体到翻译批评领域，则表现为翻译批评方法和批评者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即批评者的翻译观之间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和连带性。通常，方法和观念的这种一致性和连带性是难以剥离的，批评家选择、应用什么样的方法，都不能不受到批评观念的支配。换言之，批评家的翻译观念往往决定着批评家对批评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具体的翻译批评活动中，不考虑这种观念和和方法的一致性与连带性，方法的介入就会产生很大的盲目性，并最终影响翻译批评的效用。鉴于翻译批评者主体性的存在和主观性观念对批评方法的影响和制约，在翻译批评实践中应站在理论与实践共同的投影处看待主观性的不可回避性问题和每一种评论方法都适用与特定领域的矛盾特殊性问题，科学、公正看待评论中部分片面之处存在的客观事实，及其与整体的、基本观点上的片面性的差异性。而评论中的主体并不应就此钻理论与实践的

空当,应做的应为全面客观的分析和弥补理论和实践交接融合过程中可能产生不足,积极追求客观全面,谢绝偏见,最大程度上避免片面性。

另一方面,从翻译批评方法构建上而言,其应为十字形态,横向打到变,纵向打到位,纵横融合统一于翻译批评本身之中:在评论时,评论者应该全面根据具体情况特殊性考虑是普遍现象还是个别现象,是局部问题还是全局问题,还应充分考虑译者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分析其对于译者可能所产生的影响,不能仅以批评者自身思想和立足点作为依据,同时应考察所译作品的语言难度、结构体系(如,同时期内某文本两种不同语言译作的比较)文化远近等等各方面的因素,这样即使所评的是所节选的章节而不是整部译作,也可最大程度上评的公正、不片面。同时批评者应当具有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意识,不单静态分析翻译批评的实践,更应将其分析动态化,置于历史过程之中。避免拿今天的标准去绳法前人,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和考虑到一系列可变因素所起造成的效果与影响。如,五四时期译本的语言风格和半个世纪以后的译本显然存在较大差别,前者用的是早期白话文,偶尔还会用文言;欧化句式作为一种新的语言成分尝试性地进入汉语,尚待调试,汉语本身也有许多新词尚未稳定,此种情形就直接影响了译文的可接受性,今人听起来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情况当然就不是译者个人所能左右的,如果对这一“时间差”所造成的影响考虑不够充分,一味嘲笑郭沫若早期译诗用词怪异,或胡适译作中人名译法不妥等等,批评就难以服人,也是非科学的。

三 翻译批评标准的设定与批评的“度”

批评标准是一个应用于批评活动的尺度,批评者是用它来评定作品位次的,标准设定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批评的效用,设定好会推动翻译批评的发展,提升翻译的质量。如若不合理则会将翻译批评推向不理想的极端,不利于翻译批评自身的发展,也会影响翻译活动的进程,从而不利于译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笔者欲就此从下述两个方面略作分析。

第一,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语言学转向,促使认识论的主体哲学转向了语言论的解释哲学,译者所追求的确定意义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与颠覆,原文的意义失落于无限解释的可能性,但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活动,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其专属的内在规定性,即任何翻译活动都必须是对原文意义的传达,是原作世界在译作世界中的能动的反

映。因此,翻译批评也就必须观照这种传达的效果,“翻译批评者必须是首先要与原作者通过原文文本进行对话交流”^{[10]354}。因为“在无法企及的作者企图与众说纷纭、争持难下的读者意图之间,显然还有个第三者,会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作出不同解释,即‘文本意图’的存在,它使得一些毫无根据的诠释立即露出马脚,不攻自破”^{[11]30}。因此,翻译批评首要的阐释原则应当是以原文为参照,着力于原作与译作文本意义对应转换效果的阐释。

第二,翻译批评在注意对译作本身意义阐释的同时,还要考虑译作置身其中的文化氛围。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品产生之后,便会具有独立于作者而存在的特性。即一部译作产生之后,它也便独立于原作而存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此,翻译批评就不能不关注对译作本身的阐释。这种阐释要求批评家不拘泥于从文本到文本的批评模式,将译作置于译入语文化背景中,结合译入语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诗学中影响翻译的思想和观念,从译作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中综合、分析译作的得失,而后将所得结论再放回到译作的阅读中,从而使译作中那些并不明显或一般读者难以发现的东西凸显出来。就是说,批评阐释的完成不是停留在表面道理的叙述上,而是在对译作文本有力深入的阅读上。这种经过强化了了的阅读又可以为新的批评阐释提供感性体验的基础,从而使得批评阐释和译作阅读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强调将批评阐释置于译入语语言文化背景中可以有利于克服批评阐释中流于随意和不充分等弊端。

以对严复的翻译批评为例,如果仅以“信达雅”为衡量标准,将严复与原著进行语言、内容、风格等方面的对比,可能会得出严复的翻译其实是不忠实于原作的胡译、乱译的结论。如傅斯年在《译书感言》一文中,就认为“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甚至说“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上起诉;不然,也要登报声明”^{[12]211}。还有鲁迅和瞿秋白等人,从发展中国语言文字的目的出发,对严复所倡导的“雅”字进行猛烈抨击。可是如果将严译放置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以历史的眼光去考察,那么就会发现,当时的中国社会积贫积弱,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而国民愚昧、朝廷腐败是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严复作为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试图通过自己的翻译来促动统治阶级改良中国社会,而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在译作中并未严格遵循自己提出的“信达”

标准,而是高扬起“雅”的旗帜,以争取最高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对其译作的青睐,就不仅是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了,而在其译作对当时中国社会所起到的宣教启蒙作用,则是任何人也不可否认的。由此可见把握好阐释的度,对于批评的客观多么的重要。

总之,在进行翻译批评的时,批评者应注意这

一过程中涉及各个要素,在进行翻译批评的同时处理好与被批评者在学术层面的关系,在方法的把握和选择上要力求科学、合理和公正,设定好所要进行批评的标准,勿脱离实际、天马行空,以务实的态度进行批评,把握好批评中的幅度问题,才能更好地进行批评实践和理论研究,才能更深理解批评的内在规定性,促进批评发展、提升翻译的质量。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季羨林,许钧.翻译之为用大矣哉[J].译林.1998,4.
 [2]孙致礼.谈新时期的翻译批评[J].中国翻译,1999,3.
 [3]赵家祥,聂锦芳,张立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5]鲁迅.对批评家的希望[A].鲁迅全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6]Newmark.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7]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
 [8]温秀颖等.英汉翻译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9]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10]吕俊.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1]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3]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Management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Rationalization” from the Dialectic Perspective

FENG Chun-gu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Translation criticism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supervis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As an activity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highly concentrated on by theorists and scholars, it connects the theoretical improvement and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particularly on how to cope with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zation” well—the core issue in the course. The article targets at making some discussions from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ranslation critics and those who are criticized; the understanding of selecting the translation criticism methods; and the standard arrangements so as to make some reference for translation critics in criticism practice.

Key words: Dialectic Mind; Translation Criticism; Rationaliz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